

# 日本近代文字改革论中的 中国与西方\*

陈月娥

**【提要】**从他者的视角,考察近代日本文字改革论中频繁出现的“支那”与“西洋”的关系及其所蕴含的意义,对改革主体日本而言,“支那”与“西洋”作为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完全迥异的两个他者,处于完全对立的两极。前者是“否定性的他者”,而后者则成为“肯定性的他者”,二者既互相对立又完全相关,彼此在对立中证明对方,也证明自己,共同为废除汉字、实现表音文字的改革主张提供有力的现实依据,保证其合理性、正当性和必要性。二者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差别,使得明治精英认定“支那”文字过时而落后,“西洋”文字现代而先进,也更坚定了他们谋求“西化”的同时“去中国化”的意志。

**【关键词】**汉字 文字改革论 “支那” “西洋” 他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6-0108-05

正是得益于汉字,日本才能更早地以文字形式记录其历史文化,更早地融入中华文明圈,从而加速其文明发展进程。毋庸置疑,汉字之于日本贡献巨大。然而,历史的发展诡异难料,尽管日本受惠于汉字,但自明治以来,汉字却遭到日本精英阶层的肆意炮轰和广泛质疑,其在日本文字中的地位岌岌可危。明治时期,日本出现了“英语国语论”、“罗马字国字论”、“限制汉字使用论”、“假名文字论”、“废除汉字论”、“新字论”等各种文字改革论调。这些论调都把矛头指向了汉字这一已被日本使用上千年之久的权威文字,认为日本应该废除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完全采用表音文字书写日语。汉字的存废问题与选用何种表音文字书写日语成为近代以来日本文字改革的两大核心问题。

应该说,日本文字何去何从,这一问题原本只是日本一国的事情。然而发人深思的是,“支那”和“西洋”两个词汇却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文字改革言论中,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两个要素。本文拟从他者的视角,通过研究和比较日本各种语言文字改革观点中有关中

国和西方的表述,剖析“支那”和“西洋”两个要素在日本文字改革中的关系、作用及其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

## 一、文字与文明的关联度

江户时期(1603年~1867年),随着日本知识阶层对西洋学术接受和掌握程度的提高,他们对汉字和西方文字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对比:“西洋文字字数虽少,却能通达人间万事而无不可。而唐土之文字,字数、笔画繁多,其难度居世界之首,然其通达功效并无优胜之处。”<sup>①</sup>比照西方文字,他们开始对汉字的使用价值提出质疑,甚至认为日语中的假名比汉字在表达功能上更胜

\* 本文获日本住友财团日本研究项目(项目编号:098039)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2ZS078)资助。

① [日]西川如见:《町人囊底佛》,参见佐藤喜代治《汉字讲座》第3卷《汉字和日语》,明治书院1987年版,第114页。

一筹：“若文字以传情记事为宗旨，则用我日本假名远较支那之数万文字更为便利。”<sup>①</sup> 不过，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文字的认识仅止于此，因为工业革命尚未开始，西方的物质文明尚不发达，所以日本人还没有把文字同文明的发达程度联系起来，更不会想到去改革日本文字了。

然而，当历史进入 19 世纪下半叶时，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的威力把触角延伸到了日本，迫使日本与之缔结了不平等的通商条约。尽管日本人竭力排外，但这些国家强大的科学和军事力量还是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震动，使他们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与江户时期的知识阶层不同，明治时期（1868 年～1912 年）的知识阶层把文字与文明的发达程度联系起来，认为文字决定了一国的文明进程。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就在于他们使用了“高级进化阶段”的表音文字；而日本之所以落后，就在于使用了“低级进化阶段”的汉字。例如，近代日本文字改革的发起者前岛密（1835 年～1919 年）在《议兴国文废汉字》一文中指出：“此二者（西方的语言和文字）皆备并习熟，而后有书籍、学校，然后才扩延至百般学术。此乃今日欧美强盛之源。”<sup>②</sup> 日本近代有名的植物学家矢田部良吉在《论以罗马字书写日语》一文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日本文字如此之难，空耗学生宝贵之时日，读书撰文费事费力，故而延迟学习实地知识……如用罗马字此等简易文字，则能轻松自在获得新思想、新言论，从而与西方各国一同迈进开化之境域。”<sup>③</sup> 另外，明治时期有名的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6 年～1944 年）在《国字改良论》中更是痛批汉字的“罪状”，认为日本国民的损失其祸端完全在于汉字：“如何才能与西方各国竞争文明进步？他们不足一年便掌握文字，进而开启知识学习，而我们却在长年累月为一介工具之文字而耗费精神……如此，日本国民莫大之损失皆源于汉字之使用也。”<sup>④</sup>

很显然，明治知识阶层从文字的角度解读了西方物质文明强大的根本原因，并据此坚信汉字是导致日本落后的罪魁祸首，而西方表音文字是能够让日本发达崛起的魔棒。循此逻辑，他们提出废除汉字、实现日本文字表音化就成为日本文字改革的必然之路了。

## 二、“支那”表述的政治、文化意义

“支那”一词频繁出现于日本文字改革言论并非毫无由来，它首先是凭借汉字这个媒介被日本文字改革论

者所提及：“日本所用之支那文字颇多……日本人用支那文字时，多少会被支那文字所支配”<sup>⑤</sup> “需要无数支那字……吾国男女学习支那字混写之拼写与英国男女学习英文之拼写相比，实缓慢甚多”。<sup>⑥</sup> 应该说，中国作为汉字的母国，其作为汉字的修饰语被带入日本文字改革言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他者“支那”的频现并不像是改革论者随意而为，更像是有意为之，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在作为近代日本文字改革言论滥觞的“议汉字之废除”中展露无遗。

1866 年 12 月，前岛密向将军德川庆喜提交了“议汉字之废除”的建议书。在该建议书中，前岛密言辞激烈地指责汉字对日本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唯少年时光乃探究事理之最佳光阴，然为习此象形文字之无益古学而空耗之，其（少年）精神知识因之荒疏……吾国人知识如此之低劣，国力如此之不振，究其远因，恐其毒害于此发作，令人不堪痛恨。”<sup>⑦</sup> 正是出于对汉字的这般认识和评价，所以，前岛密主张：“在百事日新之际，宜察古今，以中外之事为鉴，谋求将来远大之宏图。为此，应废除汉字……吾国文化奋进之新纪元，必始自此文字改革。”<sup>⑧</sup> 紧接着，前岛密为了强化其主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自然地、但也是有意地祭出汉字的母国——中国，指出：“支那乃东亚一大国也，土地最广，人口最多，物产最丰，兼得水陆运输之便。然数千年之久，国力衰退，远不能立欧美之上，盖源于此”，<sup>⑨</sup> 认为中国国力衰弱，民众蒙昧皆因汉字而起。可以看出，前岛密通过汉字这一媒介将“支那”一词巧妙地植入文字改革言论中，同时借用“支那”落后被殖民的悲惨境地来警示日本政府：瞧，如果我

① [日] 本多利明：《西域物语》，参见平井昌夫《国语国字问题的历史》复刻版，三元社 1998 年版，第 142～143 页。

② [日] 市岛谦吉：《鸿爪痕》，日清印刷株式会社 1920 年版，第 65 页。

③ [日] 矢田部良吉：《论以罗马字书写日语》，《东洋学艺杂志》1882 年第 8 号。

④ [日] 井上哲次郎：《国字改良论》，参见堀江秀雄编《国字改良论纂》，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 1902 年版，第 32 页。

⑤ [日] 井上哲次郎：《文字和教育的关系》，《东洋学艺杂志》1894 年第 151 号。

⑥ [日] 末松谦澄：《缀字法批评之答疑》，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中，富山房 1950 年版，第 80～82 页。

⑦ [日] 市岛谦吉：《鸿爪痕》，日清印刷株式会社 1920 年版，第 52～53 页。

⑧ [日] 市岛谦吉：《鸿爪痕》，日清印刷株式会社 1920 年版，第 67 页。

⑨ 同上书，第 71 页。

们不废除汉字，革新日本文字，那么日本的下场将和中国一样。

关于汉字导致中国国力衰弱的论证逻辑并非前岛密一人专用。继他之后，其他文字改革论者也乐此不疲地强化这种逻辑思路。明治时代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文部大臣的外山正一（1848年～1900年）在《汉字破》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举凡传播知识交流思想之文字，唯支那及日本古来所用支那汉字乃最不便者，极大碍于文明开化。”<sup>①</sup> 为了使其主张令人信服，外山正一亦以身边的现实政治为例，祭出中国：“支那因习用汉字而劳神费力，无暇钻研科学技术，故与外国交战皆败北。若以此为不实之事，则中法战争可为证据。知晓甚多汉字，却不会战争。”且不管前岛与外山的论证是否合理，其见解和主张是否经得起推敲，近代中国文明发展滞后、遭受外强欺凌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历史现实不仅为日本文字改革论者废除汉字的主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依据，而且也似乎证明了他们主张的必要性、正当性和合理性。

在这里，汉字与中国融为一体，互为论证前提。一方面，日本精英们认为“大毒物”、“完全无用之物”<sup>②</sup> 的汉字导致了“东洋诸国与使用二十六字母之西洋诸国间文明富强程度之大差异”。<sup>③</sup>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停滞落后、遭受外国列强欺侮的悲惨状况也使得汉字失去了昔日权威文字的光辉，在他们看来，继续使用文明已然衰败国家的文字只会让日本更加落后，无法与西方竞争：“此种不堪一用之文字实不能期待与西方人共进步”；<sup>④</sup> “汉字阻碍吾文明进步，其程度之甚，实不可估量。”<sup>⑤</sup> 明治知识阶层的这种思维逻辑在甲午战争后的文字论中得到了最好的展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不仅使得明治精英们对中国国力的衰败有了最直接的亲身体验，更为日本的汉字废除论者提供了难以驳斥的现实依据。明治·大正时代的国语学者冈田正美（1871年～1923年）从中国的失败和日本国粹主义的高涨中解读了汉字废除论再次兴盛的内在因和外因。他说：“在黄海战役，吾军大力摧毁敌方战舰，在旅顺、威海攻破敌方要塞，此态势旋即使吾国有形无形间得以壮大，因之，吾国民亦群情激奋，彻底废除汉字之舆论再度兴起”。<sup>⑥</sup> 而田中万年等人更是露骨地指出：“吾国海陆军连战连捷，所向披靡，支那人无不顺从朝日旗帜之盛威，然吾国之国语文章界，依然受制于支那文字，令人倍感遗憾”；<sup>⑦</sup> “据此事件（甲午战争），支那之实力远逊于吾国已是不争事实。故此，……对其文明崇拜之意识亦随之淡薄。此种关系直接影响到国语方面，推动吾国人尊重假名文字、无须使用支那汉字之风气”。<sup>⑧</sup> 他们对战胜国日本

依然在使用战败国中国的汉字及汉语词汇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日本应该借此大好机会彻底排斥并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

如上所述，相对于改革主体的日本而言，中国这个他者所承担的不仅仅是汉字母国的角色。这个身处累卵之危的他者的现实境遇一方面为日本的精英阶层展示了一幅非常悲观的前景，令他们完全丧失对汉字文化的自信；另一方面，亦为他们力主废除汉字、改革日本文字的主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现实依据，从而更显出其主张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文字改革论中的“支那”既是“不可回避的他者”，<sup>⑨</sup> 又是“否定性的他者”，<sup>⑩</sup> 而且是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否定性的他者”。

### 三、关于“西洋”表述的政治、文化意义

同“支那”一样，“西洋”是明治时期文字改革论中频繁出现的另一个他者，它首先是作为表音文字的修饰语而出现的。在“议汉字之废除”一文中，前岛密非常明确地提出日本应效仿西方，使用表音文字来普及国民教育。他说：“吾国亦如西洋各国，使用表音文字（假名）施行教育，勿用汉字，最终在公私文章中得以废

- ① [日] 外山正一：《汉字破》，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中，富山房1950年版，第24～25页。
- ② [日] 前岛密：《关于学制施行之际的国字改良建议书》，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上，富山房1950年版，第50页。
- ③ [日] 大槻文彦：《假名学会之问答》，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上，富山房1950年版，第122页。
- ④ [日] 矢田部良吉：《论以罗马字书写日语》，《东洋学艺杂志》1882年第8号。
- ⑤ [日] 小島一騰：《日本新字序言》，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中，富山房1950年版，第73页。
- ⑥ [日] 原敬全集刊行汇编《原敬全集》上卷，1929年，第548页。
- ⑦ [日] 冈田正美：《议全部废除汉字及国文国语国字之将来》，《帝国文学》1895年第1卷第11号。
- ⑧ [日] 田中万年：《关于国语研究》，参见久松潜一编《落合直文 上田万年 芳贺矢一 藤冈作太郎集》，筑摩书房1968年版，第115页。
- ⑨ [日] 白鸟库吉：《必须使用言文一致的历史原因》，参见帝国教育会内言文一致编《言文一致》，东洋社1902年版，第105页。
- ⑩ [日] 子安宣邦：《“亚洲”是如何被表述的——近代日本的东方主义》，藤原书店2003年版，第145页。
- ⑪ 同上书，第157页。

除汉字之使用”。<sup>①</sup>如此，“西洋”作为使用表音文字的地域，以修饰成分顺理成章地进入改革言论，并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今以西洋字书写日语，其利害竟如何？……有十利，应推行”；<sup>②</sup>“吾辈以为以如今西洋各国通用之罗马字书写吾国言语，则至便”；<sup>③</sup>“西洋各国，仅用二十六字母实行教育，习此二十六字母，即可通晓一切字句”。<sup>④</sup>透过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明治精英们无一不是奉西方表音文字为圭臬，主张日本彻底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此处的“西洋”作为表音文字与罗马字的修饰成分，表面上只不过表达了一个地域信息而已。然而，实质上，它并非简单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作为一个既与“支那”实体概念完全对立，同时又完全异于日本的实体概念而存在，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意义。

在当时的文字改革言论中，源自“支那”的汉字被肆意攻击为“妨碍日本文明进步”<sup>⑤</sup>的“无用之物”和“大毒物”。而作为表音文字的罗马字则受到明治精英们的大力追捧，被评价为“方今文明诸国通用”、<sup>⑥</sup>“文明世界通用最广”的文字。<sup>⑦</sup>可以说，罗马字前面作为修饰语的“文明”一词至关重要，它为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明治精英的改革动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认识契机。在他们看来，文字有用与否、进步与否，与国家的文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文明发达的国家所用文字必然高效便捷，而文明发展落后的国家其文字也必然落后低效。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他们以“方今文明诸国”、“文明世界”通用的文字为由，提出废除汉字而改用罗马字便再自然不过了。应该指出，明治初期的日本精英阶层一方面真切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和先进，另一方面也切身体会到日本文明的落后与衰弱。面对以坚船利炮为标志的西方先进文明，明治精英阶层普遍存在着“自卑心理”，<sup>⑧</sup>他们深信，“西洋”文明才是最先进的文明，日本应该一切向西看，并按“先进文明”的模本来重构日本文化与文明。在日本文字改革论中，明治精英对“西洋”物事的认知方式和评价态度就非常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心理。

首倡用罗马字取代汉字的日本学者南部义筹（1840年～1917年）在《修国语论》一文中，盛赞“西洋”人治学容易，远胜文字复杂的中国人。他说：“夫西洋之为学也，唯知字母二十有六，解文典之义，则无不可读之书，是其所以为易也。”<sup>⑨</sup>同南部一样，众多改革论者毫不掩饰他们对“西洋”的溢美之词：“西洋人思想活跃，其著述鞭辟入里，论理清晰明了，稍习西学之人皆深悟此事”；<sup>⑩</sup>“在西洋，一种书写便解决问题，而在吾国，则要知晓至少两种文字。因此，远在吾国人最终掌握文字之书写之前，西洋人既已开

始钻研开发知识之学问了。”<sup>⑪</sup>类似的言辞在文字改革论中不胜枚举，由此可见明治精英们对“西洋”物事是何等的憧憬和向往。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明治精英们唯“西洋”文明马首是瞻的同时，日本一些文化精英开始发表保存日本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的言论。对日本近代文学的诞生作出巨大贡献的文艺评论家坪内逍遥（1859年～1935年）在“新文坛的两大问题”一文中这样评价罗马字论者：“该罗马字协会，倡导改良文字运动，然察其运动之精神，颇染欧化之习气”，<sup>⑫</sup>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罗马字论者浸淫于“西洋”文明的思想特征。日本教育家井上圆了（1858年～1919年）在评点废除汉字论者时指出：“还有不加思考便完全接受洋人批评之洋人崇拜分子……有洋人曰汉字乃世界最难文字，故洋学家们提出废除汉字之言论。此言论只能被视为洋人崇拜教之教徒之理论”，以冷峻诙谐的语言对盲目崇拜“西洋”物事的明治精英们进行了揶揄讽刺。

总之，频现于日本文字改革言论的“西洋”并非简单抽象的地域称谓，而是一个富足开化、具有先进物质文明的实体形象。这个形象勾起了明治精英们的无尽遐想，使得他们认为在“西洋”通用的罗马字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日本若能采用罗马字之类的表音文字，

- ① [日] 市岛谦吉：《鸿爪痕》，日清印刷株式会社1920年版，第51～52页。
- ② [日] 西周：《论用西洋文字书写国语》，《明六杂志》1874年第1号。
- ③ [日] 田中馆爱橘：《倡议以罗马字发行本会杂志及关于罗马字用法意见》，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中，富山房1950年版，第34页。
- ④ [日] 井上哲次郎：《文字和教育的关系》，《东洋学艺杂志》1894年第151号。
- ⑤ [日] 原敬全集刊行汇编《原敬全集》上卷，1929年版，第548页。
- ⑥ 同上。
- ⑦ [日] 朝比奈知泉：《日本今后的文字和文章》，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下，富山房1950年版，第57页。
- ⑧ [日]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28页。
- ⑨ [日] 南部义筹：《修国语论》，参见吉田澄夫、井之口有一编《国字问题论集》上，富山房1950年版，第40页。
- ⑩ [日] 矢田部良吉：《论以罗马字书写日语》，《东洋学艺杂志》1882年第8号。
- ⑪ [日] 井上哲次郎：《文字和教育的关系》，《东洋学艺杂志》1894年第151号。
- ⑫ [日] 坪内逍遥：《新文坛的两大问题》，《早稻田文学》1895年第86号。

则将与“欧洲诸邦共同驰骋于开化之疆域”。<sup>①</sup>应该说，“西洋”以它的实体意义为日本文字改革论者提供了貌似有力的现实依据，使其坚信废除汉字、采用表音文字这一改革主张是完全必要、合理和正确的。对改革主体日本而言，“西洋”成为不可或缺的另一他者。尽管井上圆了等人对汉字废除论者的自卑心态和盲目崇拜意识进行了批判反思，但这丝毫不影响“西洋”作为他者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 四、结束语

在近代日本文字改革论中，“支那”与“西洋”作为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完全迥异的两个他者，处于完全对立的两个极端。对改革主体日本而言，“支那”文明落后，“西洋”文明进步：“支那”蒙昧，“西洋”开化；“支那”国力不振，“西洋”强大富足；“支那”被人殖民，“西洋”扩张海外。因此，“支那”成为日本急于摆脱其文化影响并疏离的对象，而“西洋”则成为明治精英们心驰神往、极力效仿的榜样。很显然，在文字改革论中，“支那”是“否定性的他者”，而“西洋”则成为“肯定性的他者”，二者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差别，使得明治精英认定“支那”文字过时而落后，“西洋”文字现代而先进，因此更坚定了他们在谋求“西化”的同时“去中国化”的意志。

不过，作为两个至关重要的他者，“支那”和“西洋”在对立关系中却又密切相关。对明治精英们来说，正是由于先进发达的“西洋”的对照，他们才会联想到汉字可能是中国愚昧落后的根本原因；反之，也正是因为倍受列强凌辱的“支那”的反衬，他们也才会联想到

罗马字就是“西洋”各国兴盛繁荣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支那”与“西洋”两个他者在对立中证明对方，也证明自己，共同为废除汉字、实现表音文字的改革主张提供有力的现实依据，保证其合理性、正当性和必要性。

发人深思的是，明治精英阶层从文字决定文明发展进程的逻辑思路提出了日本要废除汉字、采用表音文字的改革主张，而这一主张亦被明治政府采纳，成为近代日本改革文字的重大目标之一。然而，近代以来至今，日本一百多年的文字改革历程表明，汉字不但未从日语中消亡，反而一路化险为夷，不仅依然作为日本最重要的文字被广泛使用，而且顺利地解决了打字机、电子设备等现代化机器处理汉字的技术难题，成功地适应了数字化时代高效、便捷、大量地处理信息的发展需要，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由此看来，文字本身是否有先进落后之分，能否以国家的文明发达程度来判定其文字的使用价值，汉字在现代日语中的使用情况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最好回答。

本文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① [日] 矢田部良吉：《论以罗马字书写日语》，《东洋学艺杂志》1882年第8号。

### China and the West in Modern Japanese Language Reformation

Chen Yue'e

**Abstract:** The Japanese writing system seems to be “Japan’s internal business”, but for the reforming Meiji Japa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two politically and culturally different aliens, became indispensable elements in the debate on Japanese writing signs reformation. As China was regarded as the negative “It”, while the West was the positive one, their differences prompted the Meiji cultural elites to believe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backward and outdated whereas the Western letters were modern and advanced. They therefore tried to elbow out Chinese influence and push towards westernization. Ultimately, the two “It” s, China and the West, opposed and confirmed each other in this confrontation, providing a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ing the necessity, fea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reformation of Japanese writing.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reformation of Japanese writing; China; the West; It